

亲历中国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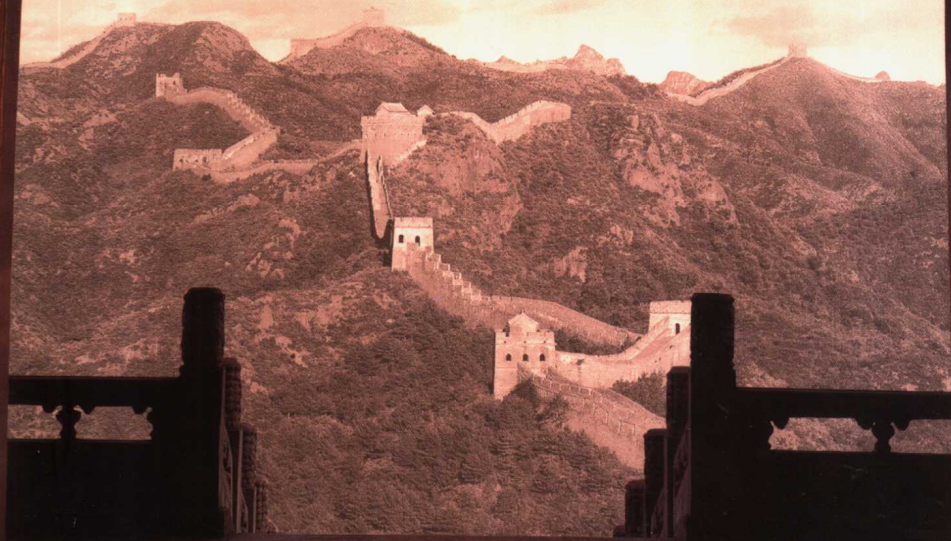
主编：耿昇 李国庆

港督话神州²

(英) 亨利·阿瑟·布莱克 著
余静娴 译

(外一种)

China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港督话神州

(英) 亨利·阿瑟·布莱克 著

余静娴 译

罗汉 校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港督话神州(外一种)/(英)布莱克著;余静娴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6

(亲历中国)

附:画里中国

ISBN 7-5013-3148-0

I.港… II.①布…②余… III.游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IV.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3150 号

书名 港督话神州(外一种)

著者 (英)亨利·阿瑟·布莱克著 余静娴译 罗汉校译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

66174391(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8.625

版次 2006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7-5013-3148-0/K·1293

定价 22.00元

序

外国人来华，大致始于两汉，继之于唐，盛之于元，明清之际出现了大举涌入的先兆，到晚清时期才形成一股巨大潮流。国外发展至今的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海外汉学，其发祥时代的第一阶段，便是“游记汉学”，亦可称之为“记实汉学”(游记、航海记、出使报告、经商报告、日记、札记、书简、考古报告)；其后发展为“宏观汉学”，即译注中文基本经典和全面笼统地介绍中国；最后才发展成经院式的汉学研究，将汉学纳入到了全人类整体的学术研究范畴中。中国人很早就曾出西域、东渡日本或下南洋。外国人也不断来华，与中国社会各界接触。这就是中国人走向世界和了解世界之肇始，同时也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交往之源缘。不过，两汉时期的外国人入华，主要还是为了朝拜天朝上国、入贡和从事贸易等，尚谈不到科学和学术方面的探讨。

外国人的来华游记，除了日本遣唐使的历次报告之

外，就是元代入华的方济各会士们了。如柏朗嘉宾 (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年)，他于1245-1247年出使蒙古并参加贵由汗的登极大典，回国后向教廷提交了《蒙古史》的出使报告。他的使命是游说蒙古人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结盟以联合对抗撒拉逊人，同时也充当了刺探蒙古人实力的“间谍”角色。他的外交使命彻底失败了，却提供了西方有关亚洲人类学、宗教学和史地学的第一部真正的科学论著。继此之后，又有鲁布鲁克 (Guillaume de Roubrouck, 1215-1270年) 于1253-1255年出使蒙古，鄂多立克 (Odoric de Pordenone, 1286-1331年) 于1318-1328年出使中国，马可·波罗于1271-1295年出使中国，孟德高维诺 (Jean de Mont-Corvin, 1247-1328年) 于1289-1328年任北京大主教等。其中最有影响者，非马可·波罗及其传世名著《寰宇记》(1298年) 莫属。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发现了中国，死后发现了美洲。”因为哥伦布正是由于在阅读马可·波罗著作时受到启发，为寻找“契丹”和“日本国”，才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必须受中国政府的严格节制。这既是朝贡体制的产物，又具有外交特色，企图与中国结盟而反对其他的政治和经济的潜在对手。南洋与中亚的来华人员，大都是为在朝贡名义的掩饰下经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来华人士当属后者。

外国人大量来华并留下记述者，还是等到明末才开始。这基本与西方史学界所说的“地理大发现”是同时代的，也就是自16世纪之后。这期间的西方来华人士的代表是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他自1582年入华，直到1610年逝世于中国。他留下的那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是由金尼阁整理翻译后才出版的（1615年）。在这个时代，来华的外国人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身份也复杂起来了，身负形形色色的使命。有外交官、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商人等，甚至还有海盗和难民。他们所属的地区，已经不仅限于亚洲和欧洲了，而且还涉及到了非洲和美洲。中国已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履。此时来华的外国人，除了为“朝贡”贸易之外，已经出现了殖民主义者蠢蠢欲动的倾向了。但中国的主权还是完整的，外国来华人士无法将他们那一整套目的强加于中国。中国依然为“天朝上国”，既想派人出洋巡视天下，也希望天下诸邦来朝。

到了清朝后期，特别是继鸦片战争和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中国国门洞开，外国来华人员更多，甚至还形成了外国的“租借地”和“割让地”一类的“国中之国”。中国的边关就如同不设防一般，任人出入。这一方面与西方殖民列强的崛起，疯狂地掠夺和瓜分海外殖民地、西方资本主义也在贪婪地争夺海外市场有关，同时也是中国清政府的国运日衰、腐败无能造成的灾难性局

面。在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中，大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与殖民主义的活动相联系。最新奇的是，在大批外国来华人士之中，除了那些传统职业者之外，又多了一批学者式人物：考古学家、史地学家、人类学家、矿业学家、气象学家、动植物学家、建筑师、教育家、艺术家。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弱国无外交。清政府不但不能有效地节制这些外国人，甚至还要受制于他们。这与明末和清朝前期的形势相比，已经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些来华的外国人士回国后，或者就在中国（特别是在香港和澳门），大都要写成许多著作：出使报告、信件、游记、考察记、考古报告。他们的这些著作，无论当时是出于什么动机，至今已成了难得的历史资料，成了当时中国的写真。

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学问深奥而又在中国逗留时间较长的人，广泛地与中国各界人士交往，甚至与中国各级官府关系甚笃，直至进入皇宫为朝廷和皇帝本人效力。他们观察问题比较仔细，在各种考察中又动用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手段。他们特别注意搜集口碑传说。他们记录下的许多内容，是中国官修史不屑于记载或不敢记载的（如宫廷斗争等）。这些论述，完全可以补中国史书之阙，起到补史和证史的作用。

在清代，这些来华的外国人，除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因

素之外，还有文化与文明上的不同、文化价值上的差异、社会历史背景方面的悬殊，从而造成了他们在有关中国的著述中，既有真实仔细的一面，又有于其有色眼镜之下变形的一面。但这些人中确有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怀着崇仰的心情，不远万里，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地来到中国，站在一种不同的立场上，用一种异域人的目光，来审视中国文明者。心怀恶意者，确有其人；疑惑不解者，不乏其例；更多的人则是在对中国文明误解的基础上，建构了西方人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观念。

这些外国来华人士，所代表的利益阶级不同，文化层次参差不齐，鉴别和洞察事物的能力也各有所别。许多人来华之前，便听惯那些有关中国的老生常谈，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他们有些人在华停留时间不长，有的甚至仅仅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他们的记述是否会带有成见、歪曲和不实之词呢？这恐怕是我们面对任何历史资料时，都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官修正史时，不是也存在大量为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各取所需地作取舍的做法吗？任何历史资料，只要经过人工整理编纂，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整理者的立场、观点、愿望的遗痕与色彩，从而给后人带来了大量辨伪的工作。这也是历史研究中的普遍现象。更何况那些洋人呢？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有20多年了，中国的读者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群体了，完全能够辨别正确与错误，可以通过现象而看到本质。他们

可以区别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也善于区别历史与当代。我们对此不必杞人忧天，过分担心。

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在10年前就曾预言过，中国学术界继文化热之后，必然会出现一股旅游研究和著述热潮。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似乎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当代中国人写的游记和考察记、古人游记著作的研究与再版、外国人入华旅行记的翻译出版，已经热热闹闹地哄动了一段时间，目前依然是方兴未艾，大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与前途。这种倾向与国外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注重口传史学、口述史学之类“活史学”的潮流，也基本上是互相吻合的。

外国来华人士的亲历记述，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特别是难以觅寻。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学问，他也不可能找到所有这些书，更不可能读懂所有这些语言文字的著作。我国过去曾陆续翻译出版过其中的一些，但毕竟是沧海一粟，实难满足广大读者、科研教学工作者的需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果断决策，推出了一套《亲历中国》翻译丛书。这实在是一个有远见和有气魄的正确决策，必然会获得圆满成功。这也是出版家为促进科研和教学的发展而做出的一项贡献。

《亲历中国》只收入来华外国人的亲历记实性著作，包括探险记、笔记、考察报告、出使报告、书简等。内容力求客观、公允、真实，并兼顾其科学性和可读性。在允许的范围内，力求满足中国学术界的需要，填补空白和弥

补不足之处。

本丛书的译文力争达到高水平的信达雅，尽量保持原貌而不作删节。

在《亲历中国》丛书出版之际，笔者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郭又陵先生、本套丛书的责任编辑周玉玲先生之邀，草书本序言，以表心意。衷心祝愿这套丛书对于国内学术界理解和认识国外的中国研究，进而借他山之石攻玉，促进本国学术发展，能有裨益，做出贡献。

耿昇

2004年4月20日于京西陋室

译者前言

《港都话神州》一书是《亲历中国》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亨利·阿瑟·布莱克（1840—1918）生于爱尔兰。从1884至1907年间，先后出任巴哈马、纽芬兰、牙买加、香港和锡兰总督。1909年，出版这本堪称是19至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真实写照的书，把近代中国及其文化介绍给了西方世界。

布莱克于1898至1903年间，受英国政府委派，出任驻香港总督。期间正值西方列强窥伺中国，清王朝日益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此时，他走访了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尤其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流域，以及中国南方诸省份进行了比较周密的考察，并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如实地记录在书中。他以一个西方人特有的猎奇眼光及注重事实的思维定式，对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农业劳动、民族宗教、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对抽吸鸦片、赌博、乞丐帮会等奇闻轶事，以及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三教九流的各式人物，进行了极其细腻的描述，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作者用朴实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

中国社会生活图景，在中国历史画卷的长廊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片断，不仅使读者增长见识、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而且又使人得到历史趣味感的享受。如作者怀着对中西方文化巨大差异的浓厚兴趣，像爱探寻的顽童一般，把敏锐的目光投向下层社会的每个角落，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市井百姓的普通生活——理发、街头早餐、婚俗、山上挑担脚夫、风水迷信、赛龙舟、行业公会庆典游行等，使本书犹如一面镜子，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又如书中两处记载了清朝皇帝按照祖制规矩，一年一度在立春那天率皇子及大臣去先农坛举行纪念春天开始的祭祀仪式的细节。这种源远流长的皇帝亲自开犁的礼仪，显示了对当时中国十分之九人口所从事的农业的重视。译者曾费尽周折，才找到该遗址以考证典礼细节（先农坛公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尚在施工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因众多的北京人对先农坛和该祭祀仪式浑然不知。感慨之余，深感布莱克对此描述的史料价值。当然，书中描写的一些史实虽然会令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感到陌生，或恍若隔世，或匪夷所思，然而却是百年前古老中国的真实风貌。百年沧桑，历史巨变，抚今追昔，我们更亲切地感受到今天中国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一般说来，17、18 世纪以前，他们多以好奇和赞美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似乎是处于哲人治理下的“模范社会”，因此他们对中国备加颂扬。然而，到了 18 世纪后期、尤其进入 19 世纪，随着中国国力下降，西方殖民主义

者加紧对中国的殖民扩张，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大多为其殖民政策服务，并采取了歧视和贬损的态度。然而布莱克基于自身的体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事实上，中国的地大物博震撼了来自英伦三岛的作者，他以浓重的笔墨描绘出中国壮观的山川、富饶的江南平原和瑰丽的香港夜景。他以赞扬的口吻描述了中国人刻苦耐劳的美德：“有一项竞争中国永远不会参与，那就是比谁更懈怠和懒惰。中国的每一位国民都在竭尽全力工作，这个国家保存了完好和强大的实力。”正因如此，才有对土地与河流的充分利用，才有较高文明形式的农业、养殖业以及精湛的手工艺。诚然，对于在满清专制统治和西方列强威逼下苦难深重的广大人民，他首先得站在英帝国立场上，处处捍卫其利益，但作为人，他还是发出了同情的哀叹，揭示了内陆河道尤其是西江上猖獗的强盗抢劫，1903年的广西大饥荒，中国官员的昏庸，刑法的严酷，以及广大妇女身受封建压迫，缠足，沦为小妾、婢女的悲惨境遇。

作者在书中提到，在古希腊人曾开采过的矿上，现代人移去堆积了数百年的矿渣石头，结果，下面的土壤中长出了植物，开出了成串的奇异小黄花。这些种子已被石头压了数百年。作者由此生发开去说，“古老中国的胸怀中也潜藏着进步的种子，这些种子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重压，不能萌芽。”“而摧残进步之花的两座大山是无知和偏见。”他认为，要提取传统观念中的养分，不仅予以保存，而且要加以升华，“才能使真实、纯洁、幸福之花开遍整个大地”。他承认，西方人对于中国只有一孔之见：“普通的欧洲人一提到

中国，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个未开化、不诚实、充满尔虞我诈、有过多原罪的国家。”但他经过数年的研究，形成了难能可贵的独到见解，把古老的中国比作沉睡的东方巨人，相信“中国的苏醒意味着她将要进入世界市场去争取她应得的全部份额”。他预言，“中国凭借其强大的商贸实力和巨大的生产力，一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且一定会扩展到遥远的国际市场。”“除了最强的竞争者，所有的人在�她面前都会感到胆怯。”试想一下，这是在百年前对封建落后的中国何等的预言！最后，他以诚恳的语言、真挚的希望为全书作结：“（中国）即将到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会使人们从对竞争回忆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代之以理性的思考，中国一定会随之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当那个时代来临时，让我们期望：中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将是相互信任 and 良好愿望的产物。”

毋庸置疑，布莱克生活在 19 世纪“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中，其著述自然不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再加上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和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因此书中论述的某些观点（如对少数民族生活习性和义和团运动的描述等）并不是我们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尤其是有关鸦片贸易的论述，基本上是与事实相悖的。毋须赘言，读者会自行对此作出鉴别。

本书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了许多努力，但囿于水平和文化视野，有不妥之处，尚请专家、同行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余静娴

2005 年 10 月

作者介绍

亨利·阿瑟·布莱克爵士 (Sir Henry Arthur Blake) 于 1840 年 1 月 8 日出生于爱尔兰中西部地区的利默里克 (Limerick) 县, 其父彼得·布莱克是该地警察机构的巡警官。利默里克在公元 9 世纪时被挪威人占领; 在公元 10 世纪爱尔兰国王布赖恩·博鲁 (Brian Boru) 时代, 成为芒斯特省 (Munster) 的一个县城;



12 世纪时该地区由日耳曼人居住; 12 世纪末, 英国占领此地后, 建造了一些瞩目的建筑物, 如约翰国王城堡 (King John's Castle)、圣·玛丽教堂 (St. Mary's Cathedral) 和圣·约翰教堂 (St. John's Cathedral)。在 17 世纪内战时, 利默里克因其地位重要而于 1651 年二次受到英国将领奥利佛·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率兵围攻。18 世纪时, 利默里克因推进贸易而日渐发展, 但在 1800 年签订合并法 (the Act of Union)、爱尔兰与大不列颠于 1801 年 1 月合并以后, 尤其是在 1845 至 1849 年间, 爱尔兰土豆歉收引发的连年饥荒, 导致当

地经济衰退（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爱尔兰经济快速发展，才中止该地经济滑坡）。利默里克县于 1991 年建市，现有 3 个城区，国王岛上古老的英格兰城区；南部为爱尔兰城区；再往南是 1769 年建造的佩里（Pery）城区。该地教育较为发达，有利默里克大学、利默里克工学院和几所学院。橄榄球亦小有名气。

布莱克刚开始谋生时，在一家服饰用品商店里给老板当助手，但不久，于 1859 年进入爱尔兰警察机构当上了巡警官。1876 年任达夫（Duff）的常驻地方行政官（Resident Magistrate）；1882 年被晋升为特派常驻地方行政官（Special Resident Magistrate）一职。1884 至 1887 年间，出任巴哈马总督；1887 年调任纽芬兰总督，同年被敕封为爵士。1889 年任满，他又成为牙买加总督，兼民兵司令（Captain General）。应该岛国立法机构与民众团体的请求，其任期在 1894 和 1896 年两次得到延长。1898 年 11 月，布莱克出任香港总督，直至 1903 年。

布莱克是皇家都柏林协会理事会（The Council Royal Dublin Society）成员；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会员；皇家殖民协会（Royal Colonial Institute）成员。发表的作品包括 *Pictures from Ireland* 一书和 1909 年出版的本书 *China*。他一生结婚二次：1862 年与珍妮（Jeannie）结为连理，但妻子不久于 1866 年故世；1874 年续弦娶伊迪丝（Edith）为妻，育有二子一女。

布莱克任加拿大纽芬兰总督期间，当地人将一城市命名

为布莱克城，以表示对其敬意。在香港任总督时，他以中文名卜力为港人所知。在他到任前五个月，清廷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的土地（包括九龙半岛北部，深圳河南部）从1899年7月1日起租与英国99年，九龙寨仍由清政府管辖。翌年四月，卜力总督派员到大埔接管新界土地，遭到原住民强烈的反抗。由当时的驻港英军司令加士居将军派兵前往镇压。1899年4月16日，殖民地大臣张伯伦从伦敦来电，批准卜力总督的决定，于当日下午2时50分起，在大埔举行升英国国旗仪式，宣布新租借地及当地居民归英国管辖。

卜力爵士任总督仅4个月时，就敢于自称“太了解中国”了，虽然言过其实，但他确实通过打交道与潜心研究，对清廷的李鸿章、谭钟麟等老臣了如指掌，对其他头面人物和风云变幻的政坛也很熟悉。据记载，有一次李鸿章赴港，卜力总督隆重其事，当李鸿章登岸时，英方鸣17响礼炮以示热烈欢迎。登岸后，卜力在港督府会见李鸿章，二人晤谈很久，事关兴中会志士欲与李鸿章联手发起“两广独立”，由孙中山先生协助推行新政，并托港督卜力玉成其事。还有史料佐证，孙中山先生也曾写过“致香港总督书”，由陈少白起草政治方案，何启、杨衢云、谢纘泰等将之译成英文，由孙中山领衔联名呈上。书中历数时弊，拟订平治章程，表达了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欲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决心，并呼吁西方各国能平等待我之民族。对此卜力总督表示同情。而两广护国军在肇庆成立护国都司令部，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